

奧地利學派的其他重要人物

黃春興 2016-0420

任何學派的核心概念，從初始提出到流行都歷經演化過程。跟隨者不斷地追求原始語詞與概念的精確化、在個案詮釋中衍生新的問題、以及在辯論中激發出新思維。這些發展構成學派的未來，卻必須根源於跟隨者個人對原始概念的主觀理解和詮釋。當他以重新建構的概念與體系傳給下一代時，雖然堂表師兄弟屬於一個大家族，但彼此的見解已經分歧。這對以文字承載概念與論述的奧地利學派（以下簡稱“奧派”），其嚴重性遠勝於以符號為載體的其他學派。

內部歧見影響到學派的定義，也波及相關學者的歸類和評價。譬如強調米塞斯先驗論（以下簡稱“新奧派”）的霍爾庫姆(Randall G. Holcombe)，在編選《奧地利學派的大師們》時就未收錄第二代的維塞爾，對 1974 年重建奧派的大師也僅收錄羅斯巴德，不見年紀較大的拉赫曼。本書相對放寬奧派的定義，收錄了拉赫曼和較年輕的柯茲納，也收進具爭議的熊彼特，並以本章簡述寬廣定義下的其他奧派重要人物。

限於篇幅，本文介紹了八位學者。他們被收進來的理由各有不同。不論在思想或人際關係上，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奧派的關係緊密到無法否定他是奧派大家族的一員，而在他帶領下日益茁壯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經濟學系已是當今培養奧派新成員的最高教育機構。接著是奧派嫡傳第四代的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in)、馬赫盧普(Fritz Machlup)和哈貝爾勒(Gottfried Haberler)。他們和米塞斯與哈耶克在相同年代離開維也納，長期維持著往來關係。他們帶有不同程度的維塞爾學統，在方法論和世界觀上與新奧派不盡相同。最後陳述的四位都是已收錄在《奧地利學派的大師們》而本書未以專章介紹的大師，其中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 對奧派在美國的立足與傳播之貢獻無人能出其右，也是著作等身的奧派公眾人物。威克斯蒂(Philip Henry Wicksteed)和赫特(William H. Hutt)都是不懂德語的英國人，在學術生涯中並未受奧派影響，卻發展出和奧派近似的概念與理論。菲特(Frank A. Fetter)留學於德國又是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的好友，回美國後致力於奧派理論和政策的推展，然而，卻自認其學術理念比較接近美國制度學派的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

這幾位大師長期守護著奧派的核心概念，也同時堅持著某些不同於今日奧派

學者的觀點。不論他人或自己如何給他們定位，我們從這些大師的學術生涯即可明白：奧派成員遠比我們熟識的人物更多，而奧派的視野也比我們理解的範圍更廣。

布坎南 (1919-2013)

就思想言，最寬鬆的奧派定義是傳承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這傳統下的奧派堅守私有財產權，主張最小功能的政府，追求不受壓制的自由社會。無可避免地，他們在論述上必然離不開方法論個人主義。這些學者包括早於門格爾的馬里亞納(Juan de Mariana)、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杜爾哥(A.R.J. Turgot)、薩伊(Jean-Baptiste Say)和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等，以及之後的克努特·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諾齊克(Robert Nozick)、與葉格(Leland B. Yeager)等人，而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為最佳代表人物。

在 1986 年的諾貝爾獎講詞中，布坎南指出其體系的三要項：方法論個人主義、經濟人、和作為交易的政治。這和奧派的兩項核心概念是一致的，亦即：方法論主觀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

布坎南以拉丁文 "homo economicus" 標註“經濟人”一詞，為了區別新古典學派常用的 "economic man"。他說：“要在市場或政治互動的領域中建構可充分操作之行為的經濟理論，沒有必要非指定淨財富或淨所得才是行為的主宰動機。”他採取亞當·斯密對於人之行動的假設：人類具有遠地交易、以物易物、和間接交易的傾向(the Propensity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所以，“（經濟學）的基礎和基本的進路應是以‘市場理論’為研究中心，而非‘資源配置理論’。我衷心的訴求是（經濟學）能易名為更精確的交易學(catallactics)。” (Buchanan, 1964)

布坎南是在 1948 年轉向到方法論個人主義，那時他發現威克塞爾的租稅原則：政策必須獲得人民的一致同意(rule of unanimity)。這新的視野讓他警覺到肯亞羅(Kenneth J. Arrow)於 1951 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和 1954 年所發表的關於競爭經濟的一般均衡理論，可能會把新古典經濟學帶往集體社會。我們知道，前者提出以社會作為有機體的“集體理性”概念，並發展出社會選擇理論；後者及其後的發展創造了“市場失靈”概念，並以此為由，允許政府的干預，甚至計

畫。(Arrow, 1951, 1954) 於是，他於 1954 年就展開對亞羅理論的批判，指出市場機制和政治過程的異同。他認為，個人對公共議題之見解並非預先給定，而是在民主過程中形成，一如個人在市場過程中形成對私有財之效用。他慎重地指出，理性只存在於真實個人。理性不只是邏輯而已，也包括個人想實現的目標。經濟學家若建構虛無的集體理性，勢必會消滅真實的個人理性。(Buchanan, 1954a, 1954b)

1962 年，布坎南與杜洛克(Gordon Tullock) 出版《同意的計算》，並以此書為基礎，發展以政治過程為基礎的公共選擇理論，以區別傾向於政治設計的社會選擇理論。此書釐清民主不只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制度，更重要的是票決之前必須取得一致同意的票決規則。布坎南稱此為民主過程必須具備的兩階段：決定規則的制憲前民主階段和規則下表決政策的制憲後民主階段。前者必須以一致同意為原則，而後者可以採取各種經過一致同意的多數決。

之後，布坎南繼續延伸這理論的應用範圍，從批評凱恩斯的赤字財政，到提出財政憲法，最後完成他的憲制經濟學之體系。他的“作為交換的政治”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交換為前提，排斥了在政治領域中採行極大化的分析方法。(Buchanan, 1987) 雖然布坎南發展出接近於哈耶克之“規則先於民主”的理論，但並不完全接受哈耶克對於規則的文化演化理論。相反地，他以繼承美國立國與獨立的契約傳統感到自豪。

奧茲卡·摩根斯坦 (1902-1977)

定義奧派的另一個極端是師承關係，其最寬鬆界線是僅接納門格爾部分概念的各代弟子。這定義的合理性在於第二代就開始出現了詮釋上的分歧。師承關係中最典型的代表為 1944 年和諾曼(John von Neumann) 合作開創博弈論的摩根斯坦。(Wikipedia) 博弈論的數學建構無疑是諾曼的功績，但在盛行國家利益的法西斯年代，唯有認識方法論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學者方才可能建構出允許雙方以獨立意志採行策略性行為的理論。在探討公共政策時，博弈論跳出了一人計畫的聖王作制的思維。

摩根斯坦在哈耶克和米塞斯離開維也納後，於 1934 年接任景氣循環研究所，努力讓自己成為還留在維也納之奧派學者的領導者。不過，他也擔任法西斯政府

的政策顧問。他自認繼承了門格爾之“經濟學作為正確科學”的原則，堅信政策若要作為正確科學就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只能在政府給定的目標下分析。他還認為只有極權政府才能克服利益團體對政府的影響。(Ebeling 2011)諷刺的是，他因政策建議抵觸到利益團體而遭受法西斯政府的威脅，最後只好藉著出訪機會滯留於美國。(Klausinger, 2006)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 (1900-1995)

哈贝尔勒是第四代，也是米塞斯學圈的主要成員。移民美國後，他曾在凱恩斯主義最盛行的年代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他和摩根斯坦一樣，都喜愛數學，並利用它將李嘉圖以勞動價值發展的比較優勢理論改寫成以主觀邊際效用為理論基礎。一般而言，他捍衛自由經濟，反對通貨膨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也要求政府減少政策干預。(Haberler, Ebling and Salerno, 2000)

他在 1937 年出版的《繁榮與蕭條》是最早批判凱恩斯《通論》的著作。然而，不同於其他奧派，他不認為當時的赤字財政是錯的。他認為凱恩斯的理論僅能適用於嚴重的大蕭條，不應稱為“通論”。在相對溫和的蕭條時期，自由市場“仍具有自動調整的能力”。他說，“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強調的真實的惡性調整無法解釋如此嚴重的大蕭條，那是第二度通縮造成的。”在解釋景氣循環上，他逐漸走向芝加哥學派。(Haberler, Ebling and Salerno, 2000)

在新奧派眼中，哈贝尔勒是個“右翼凱恩斯主義者”(Salerno, 2016)，不僅認同凱恩斯給大蕭條開的處方，也偏離奧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但他則認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只是用以理解社會現象的理論架構，未必能用以處理現實的問題。個人主義承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但奧派不能“過度解釋”，誤以為每個人對困境都有相同的調整能力。他說，“整個經濟太過複雜，我們必須採用總合變量。”但這僅限於大蕭條時期，因為這時大多數的人都已經失去了調整自己的能力。如果總合概念“過度使用”，依然是錯誤的。就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偶而出現的蕭條都相對溫和，不可以還繼續利用總合變量去設計政策。他說，難怪“凱恩斯感慨自己不是凱因斯學派”，同樣地，“馬克思發現自己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沒說出來的應該是，門格爾也會發現自己也不屬於奧地利學派。(Haberler, Ebling and Salerno, 2000)

弗里茨·馬赫盧普 (1902-1983)

由於龐巴維克逝世較早，而第三代的米塞斯還只是兼課教師，同屬第四代的馬赫盧普、莫尔根斯泰、哈貝爾勒與哈耶克主要受教於維塞爾，難免感受到他對費邊社會主義的同情。不過就如馬赫盧普在訪問中說，他還是比較喜歡去聽年輕有活力的米塞斯的課。(Machlup, Salerno and Ebling, 1980)

馬赫盧普是最早根據奧派知識理論開創知識管理和知識產業之研究領域的學者，也曾以不同於其他學派的七大學術要旨去定義奧派。(Wikipedia) 但他在 78 歲接受訪問時指出，奧派和其他學派不同之處已經只剩下三項，亦即方法論個人主義、(方法論) 主觀主義、和生產的時間結構。當然，這並不是說其他四項，包括米塞斯加上的消費者主權，都已經被其他學派完全吸收。

此外，他還對自己的奧派提出兩點讓新奧派不甚愉快的反省。其一是，他批評米塞斯稱其方法論為“先驗論”是過於大驚小怪，因為不可能有那一種理論模型是後驗的。其二是，他認為整個奧派在 1930 年代並未認真看待經濟蕭條帶給社會的嚴重後果，只能開出太不合時宜的政策藥方，然後要求人們拉緊肚皮等待景氣復甦。即使本來處於學術巔峰的奧派，也經不起這樣的摧殘。當社會失去對它的信任時，也跟著失去對它的興趣，毫不奇怪的，學術圈內就不再關注奧派特有的純粹理論和資本理論。(Machlup, Salerno and Ebling, 1980) 其實，這兩點反省普遍存在於第四代，只是馬赫盧普的感受較深而表達方式較為強烈而已。哈耶克也曾以婉轉的口氣說：“他（米塞斯）逐漸把我從這個傳統拉出來，不過，並沒有把我完全贏過去”。(Ebenstein, 2001)

第四代普遍的看法是，學者必須面對真實的世界，否則就只會淪為意識形態的政治社群。一位哈耶克終身的朋友，也出生於奧地利的美國經濟學家弗斯(Josef Herbert Furth)就明白地指出：奧派只是一個經濟學派，並無自由主義之左派或右派的內在意涵。(Wasserman, 2015) 若以馬赫盧普所提的最後三項定義來檢視，第四代並未遠離奧派祖庭，只是那時祖庭已崩壞。他們共同的使命是以奧派理論去陳述奧地利國歷經的通膨經驗，並提出可施用於實際政治的各種政策。即使是哈耶克，也依舊在《自由秩序的原理》的後半部討論深受米塞斯指責的政策。

亨利·黑茲利特 (1894-1993)

雖然第四代對米塞斯有不少批評，他們在美國的往來還是很密切，但相互扶持的能力就相當有限。米塞斯在美國的生活，就接受美國人黑茲利特很大的幫忙。(Hazlitt and Boudreaux, 1984) 黑茲利特利用媒體工作者的身分和傑出的文筆，介紹米塞斯的《社會主義》給美國讀者，也幫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打開知名度。“如果沒有的黑茲利特的不懈努力和犧牲，奧派在美國的歷史必將被改寫。”(Tucker, 1999)

他能有這樣的功績，自然不會只是為人作嫁。黑茲利特在 1934-1946 年間擔任《紐約時報》財經版的主編，在自己的專欄中反對布雷頓森林貨幣協議，但因立場和總編輯不合而辭職。他隨之轉到新聞週刊社，繼續以專欄反對杜魯門總統的消費計畫和福利計畫，也評擊美國戰後的馬歇爾計畫。1959 年，他出版《“新經濟”的失敗》批評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銷售超過百萬本的《一課經濟學》，這本書確立了奧派在論述公共議題時的“巴斯夏——黑茲利特傳統”。(Wikipedia)

菲利普·亨利·威克斯蒂 (1844-1927)

黑茲利特在訪問中說，開啟他進入經濟學的是威克斯蒂的《政治經濟學常識》，剛巧那是一本很接近奧派的著作。威克斯蒂是英國經濟學家，與奧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同時期，但沒有直接關連或書信往來。他最重要的著作是 1910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常識》。在盛行馬歇爾經濟學的年代，該書以清晰而有力的論述介紹奧派獨有的方法論：主觀主義與市場過程。在那個時代，奧派在其後論戰中發展的理論都尚未出現，如社會主義者之計算、景氣循環、資本理論。(Hazlitt and Boudreaux, 1984)

對於主觀主義，威克斯蒂認為個人的所有選擇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無關於他是否懷抱自利或利他的情操，而他為實現自己人生所採取之行動的代價，不僅是金錢，還包括非金錢方面的犧牲。接著，他從個人的選擇去討論價格：“價格的狹隘意義是指，為了獲得某個物品、某項服務或特權而須支付的金錢。但這

只是其廣義意義下的特例。廣義意義的價格是指我們放棄的那些選擇。” (Kirzner, 1999)

對於市場過程，威克斯蒂說：“對於任一種商品，市場是一種機制，讓偏好尺度相對較高的人們和偏好尺度相對較低的人們通過市場溝通，使交易能夠在雙方滿意的條件下發生，直至實現均衡。這個過程總是且一定是需要時間。”相對於主觀主義，新奧派不會對這類客觀均衡論不無意見。對此，奧尼爾·羅賓斯(Lionel C. Robbins) 為他辯護地說：“威克斯蒂的方法和帕累托的絕不相同。均衡條件的分析不是他的重點，只是作為他解釋給定條件下之趨勢的工具。他更關注經濟現象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過程，而較少關注它的短暫結果。”當然，更重要的是柯茲納對他的背書：“在 20 世紀早期的討論中，人們很難發現像威克斯蒂的作品那樣，能夠詳盡討論競爭性市場過程的細節。” (Kirzner, 1999)

從羅賓斯對他的總評，我們就可以理解何以威克斯蒂會被視為英國奧派的先驅。他說：“在過去四十年，經濟學思考的主要來源是通過馬歇爾傳播的古典經濟學。……威克斯蒂如同吉逢斯和門格爾，認為（經濟學理論）有徹底地重建的必要。他不是一位修正主義者，而是革命者。” (Kirzner, 1999)

威廉·哈羅德·赫特 (1899-1988)

赫特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和威克斯蒂一樣都是不懂德語的英國人。他因早年發表的〈十九世紀早期的工廠體系〉一文被哈耶克收進 1954 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而知名。他說自己直到 1955 年才第一次和米塞斯面談，但“在見到米塞斯之前很久，他的傑出貢獻就透過文章和著作不斷賦於我靈感。” (Egger, 1999) 當他於 1973 年再度論述這議題時，就大量引用了龐巴維克、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論述。這時，他已普遍地被視為奧派。(Egger, 1999)

不同於威克斯蒂，赫特的年代已經出現了凱恩斯。在《通論》出版不久，他就出版《閒置資產理論》加以批評。他認為閒置是市場遭受扭曲下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若要善加利用，唯有先解除導致扭曲的政策來源，而不是採行通膨政策或進一步的公共建設。在 1955 年的《凱恩斯主義：回顧與展望》裡，他再度強調：導致大蕭條與失業的根源在於市場價格遭到扭曲，而非總需求不足。(Ebling, 1999)

布肯南認為赫特除了批判凱恩斯外，也是公共選擇的先驅。赫特在 1936 年出版的《經濟學家與公眾》中提到：經濟學家應該關注政策的長遠影響，而非當下的可行性。經濟學家唯有如此，才能免於成為利益團體的辯護者，真正地讓政策有利於公眾。然而，後代學者對他的印象則是 1940 年發表的“消費者主權”概念。即使這概念遭受羅斯巴德的批判，但至今仍常見於大學經濟學原理的教本。(Stolyarov, 2005)

法蘭克·A. 菲特 (1863-1949)

本章最後簡述美國的經濟學家菲特。他一生奉獻於奧派研究，和第二代屬於同期人物。由於地域之便，他的思想影響了米塞斯和其弟子羅斯巴德。新奧派有人認為，奧派學者除了應該熟悉門格爾、米塞斯、海耶克、和羅斯巴德之外，“或許有一些人會認為名單上還得加上菲特”。雖然這句話還帶有其他含義，但也清楚地說明了菲特在他們心中的地位。(McCaffrey, 2016)

菲特讀完印第安納大學本科後，先在法國讀碩士，再去德國，於 1894 年在康拉德(Johannes Conrad) 指導下獲得哈雷(Halle) 大學的博士。康拉德在哈雷大學是繼承德國歷史學派大師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 留下的職位。施默勒還有一位美國學生理查·伊利(Richard T. Ely)，他創立美國經濟學會，也是當時美國進步主義的領袖。(Wikipedia) 由於資料不足，我尚未獲知菲特是如何與為何一頭埋進奧派經濟學，只知道當他回到美國教書時，除了和龐巴維克和維塞爾已有很好交情，就是在 1904 年以奧派理論出版《經濟學原理》。這本書成功地把奧派介紹給美國，也標示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基本方向。這本書在美國的影響直到 1940 年才被米塞斯的《人的行動》超越。菲特是奧派在黃金年代的“一顆閃耀之星”。(Tucker, 1999)

菲特的《經濟學原理》承襲主觀主義的價格理論，認為消費財的價格決定於消費者的相對邊際效用，進一步推演到被視為衍生需要的生產因素，認為其價格決定於它們被用於生產消費財的邊際生產力。換言之，生產因素的價格是(所有)消費財價格經由市場機制而衍生的。這為奧派建立了完整的以主觀主義解釋的價格理論。(Rothbard, 2005) 在主觀主義下，即使勞動力也決定於消費財的市場價格，而不是投入的勞動力決定消費財的價格。在錯誤的勞動價值論裡，勞動力投入不

僅決定消費財價格，也決定其他生產因素（即資本與土地）的價格。由於這種解釋過於勉強，土地的價格就改為讓第二種自然力量，即土地之自然生產力去決定，也就是讓自然生產力的差距去決定價格。菲特認為這都是錯誤的見解，因為不論是雇用勞動支付的薪資、雇用土地支付的地租、還是雇用資本支付的利息，都同樣是消費財價格經由市場機制而衍生的。

這些生產因素的價格都是指在一段期間內，由市場支付其邊際生產力的單位報酬。同一單位的土地，或機器或奴隸，在喪失生產力前都能生產很多年，而每年都因具有生產力而享有報酬。將這些期間的報酬加總起來，就是該生產因素作為資產的交易價格。如果實際的交易價格低於各期間之報酬的加總，那是因為人們對於現在與未來存在時間偏好之故。他稱各期間之報酬經過時間偏好之調整再加總出來的數量，為資產的資本化價值。當然，未來所存在的風險會影響到資產的交易價格，而承擔這些生產風險的是創業家的判斷。因此，利潤不是契約工資，也沒有保障，而是對企業家之能力的回報。

菲特的完整價值理論不僅拋棄了李嘉圖和密爾以來的地租理論，也更正了龐巴維克的利息理論。菲特的成就預示將來的米塞斯可以將主觀價值論應用到貨幣，完成主觀價值的整套經濟理論。這整套理論是公設式的邏輯演繹，從人的慾望展開，期待“社會的每個成員能夠達到他的最高效率，這對社會、對個人，都同等重要。” (Tucker, 1999)

然而，菲特並不把人的慾望侷限在狹隘的自利或物質上的成就，而是包括了全部的“社會的與精神的”慾望。這觀點讓他將邏輯上的價值理論推到實際上的福利理論。他認為“由於人類天才的多樣性與不平等乃是生物性”之緣故，“對那些無視人類不平等的人來說，產業中的報酬問題肯定是個不可解的神話。”此時，“社會合意的要求仍然會促使私有財產權制度的調整。……在人們的利益不彼此和諧的地方，社會有所行動是合理的。”他的結論是，“更廣泛、更真實的政治經濟學，乃是關乎福利而非價值的理論。……如果價值原則和福利原則發生衝突，價值原則必須讓步。” (Tucker, 1999)

福利原則優先於價值原則的論述，並非出自他早期的《經濟學原理》，而是出自 1920 年代發表的文章。他並非出走奧派，因為在 1940 年代，他仍帶頭反對羅斯福的各種新政措施。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他雖然和龐巴維克和維塞爾都很親近，但自認為是和達文波特(Herbert Joseph Davenport)與韋伯倫同屬於“美國心理學

派”。心理學派在門格爾時期的奧地利，如同“維也納學派”一樣，都是奧地利學派的別名。但在美國是否依然這樣認定？韋伯倫是美國制度學派的學者，以反對經濟學過度應用邊際效用理論出名，因他相信真實的社會無法經由先驗的邏輯演繹去認識。(Veblen, 1909) 霍克西曾引述菲特的話：“(奧地利學派)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因為已經偏離經典概念太遠，而是還沒有從舊的經濟理論中徹底解放出來。”(Hoxie, 1905) 這句話是對黃金年代之前的奧派說的，是否也適用於歷經復甦卻依然脆弱的當代奧派？

參考文獻：

- Arrow, Kenneth J. and Gérard Debreu,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3). 1954: pp. 265-290.
- Arrow, Kenneth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Boettke, Peter, "Why Wicksteed Matters," <http://lfb.org/why-wicksteed-matters/> . 2013.
- Bradsher, Keith, "Gottfried Haberler, Resolute Free-Market Economist, Dies at 94,"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5.
-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 Buchanan, James M.,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0(3). 1964: pp. 213-222.
- Buchanan, James M., "Individual Choice in Voting and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4). 1954b: pp.334-343.
- Buchanan, James M., "Social Choi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2). 1954a: pp. 114-23.
- Buchanan, James M., "The 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pp.243-250.
- Ebeling, Richard M., "William H. Hutt: A Centenary Application," October 1999. <https://fee.org/articles/william-h-hutt-a-centenary-appreciation/>.
- Ebeling, Richard M., "Game Theory and the Dark Side of Envy," *Freedom Daily*. October 2011.

- Ebenstein, Alan,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St. Martin's Press. 2001. 中譯本：秋風，
《哈耶克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 Egger, John B., "William H. Hutt: The "Classical" Austrian," in *Holcombe*(1999).
- Haberler, Gottfried, Richard M. Ebling and, Joseph T. Salerno, "Between Mises and
Keynes: An Interview with Gottfried Haberler,"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20(1). Spring 2000.
- Hazlitt, Henry and Donald J. Boudreaux,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Hazlitt,"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5(1), Spring 1984.
- Herbener, Jeffrey M., "Frank A. Fetter: A Forgotten Giant," in *Holcombe*(1999).
- Holcombe, Randall G. ed., *The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 Hoxie, Robert H. "Fetter's Theory of Valu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1905:
pp. 210-211.
- Kirzner, Israel M., "Philip Wicksteed: The British Austrian," in *Holcombe*(1999).
- Klausinger, Hansjörg, "From Mises to Morgenstern: Austrian Economics During the
Ständestaa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9(3). 2006: 25-43.
- Machlup, Fritz, Joseph T. Salerno and Richard M. Ebling, "An Interview with Fritz
Machlip,"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3(1). Summer 1980.
- McCaffrey, Matthew, "We Need to Talk about Frank (Fetter),"
<https://mises.org/blog/we-need-talk-about-frank-fetter>, 2016/3/11
- Rothbard, Murray N., "Fetter the Radical," as "Introduction" to Frank A. Fetter's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2005.
- Salerno, Joseph T., "Gottfried Haberler," <https://mises.org/profile/gottfried-haberler>,
2016.
- Stolyarov, G. II, "Austrian Economics and Consumer Sovereignty," *A Journal for
Western Man* 43(2). 2005.
- Tucker, Jeffrey, "Henry Hazlitt: The People's Austrian," in *Holcombe*(1999).
- Veblen, Thorstein, "The Limitations of Marginal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7(9). 1909: 620-636.
- Wasserman, Janek, "Austrian Economics: Made in the USA,"
<http://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159020>. 2015-4-12.
- Wikipedia, "Frank Fetter," "Henry Hazlitt," "Fritz Machlup," and "Oskar Morgenstern,"
2016.